

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汉译精品
思想人文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英] 丹尼斯·史密斯 著 萧韶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by Dennis Smith

汉译精品 · 思想人文

齐格蒙特·鲍曼

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英] 丹尼斯·史密斯 著 萧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格蒙特·鲍曼/(英)史密斯著;萧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5

书名原文: 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ISBN 978-7-214-03300-0

I. 齐... II. ①史...②萧... III. 鲍曼, Z.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8655 号

Zygmunt Bauman; Prophet of Postmodernity

Copyright© 1999 by Dennis Smith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2002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1-007 号

书 名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

著 者 [英]丹尼斯·史密斯

译 者 萧 韶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狮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3300-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部分 确定议事日程

- | | |
|----------------|----|
| 第一章 没有指南的生活 | 3 |
| 第二章 艰难的选择 | 21 |
| 第三章 谁是齐格蒙特·鲍曼？ | 35 |
| 第四章 往昔的力量 | 52 |

第二部分 通往后现代性之路

- | | |
|-----------------|-----|
| 第五章 通往西方之路 | 67 |
| 第六章 通往乌托邦之路 | 84 |
| 第七章 通往柏林墙之路 | 106 |
| 第八章 三部曲 | 121 |
| 第九章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幻象 | 146 |

第三部分 对 话

- | | |
|---------------------------|-----|
| 第十章 在批评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之间 | 183 |
| 第十一章 齐格蒙特·鲍曼与丹尼斯·史密斯的五次通信 | 204 |

- | | |
|----------------|-----|
| 附 录 与凯茨·泰斯特的对话 | 237 |
|----------------|-----|

- | | |
|--------------|-----|
| Bibliography | 256 |
|--------------|-----|

第一部分 确定议事日程

第一章 没有指南的生活

引 子

假如你对时下极为流行的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论争感到生疏的话,最好先读一下齐格蒙特·鲍曼的书。当今世界有许多最有趣的、最有影响的、对我们人类生活境遇的许多方面加以论述的理论家,鲍曼就是其中一位。

鲍曼精彩地描绘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穿越现代性的艰苦历程,同时,他也描绘了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之时,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生动景象。

鲍曼是他所叙述的故事的一部分。人们可在他绘制的图景上找到他。他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在苏联接受教育,与红军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过德军。1968年,他从波兰移居西方。从那时起,他每一两年出版一本新书。

批判性的视角

本书对鲍曼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著作进行概述,并提供了对于这些著作的批判性的视角。我企图深入到“文本”的后面去理解它们为何产生,它们试图达到什么目的。

鲍曼要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创造性潜能和道德责任。不难看出,他对这一点十分明确。然而,鲍曼确定自己目标的方法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鲍曼自己没有声明这些界定和方向的转变。它们不得不通过一系列的批判性分析加以重构,这是我在此书的第一部分要承担的任务。在这一部分,我勾画出鲍曼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主要轮廓——从年轻的避难者、战时的士兵、军官、修正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到流亡者。

这类分析询问的是:“为什么有这种议事日程?”“为什么这种议事日程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能将一个特定文本看做一个更大的作品群的一部分,特别是假如那个更大的作品群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对这一特定文本的反应将会有所改变。我说“讲述它自己的故事”,好像这一过程是毫无疑问的,简单得就像下载一个文件。事实上,它要求全神贯注地加以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不得不在紧张的控制中保持想象力,避免没有根据的假设,避免脱离证据走得太远;同时,也不忽视存在着的证据。

我假定这是一个优秀的侦探正在从事的一些工作,尽管我必须直截了当地说,我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定罪的依据”。我极为赞同鲍曼的目的。我的好奇心来自吸引而不是怀疑。

本书的第一部分——“确定议事日程”——开始了我对一个漫长历程的理解,这一历程从 60 年代鲍曼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开始,延伸到 90 年代他对“后现代性及其不满”的召唤。本书的第二部分标

题为“通往后现代性之路”，根据在第一部分形成的解释，我表明了如何理解鲍曼用英语写作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我勾画出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认识的系谱学，并且探索了其知识的含义。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对话”中，我从其他方面赞美了鲍曼的作品。我把他放置在一个被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所占据的领域，检验了其会合点和张力点。在这一背景下，我特别关注了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和利奥塔。最后，我与鲍曼以书信的形式讨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本质，这些书信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

本书以鲍曼所探索的诸方法论原则中的一种为样本。借助鲍曼在《按社会学的方法思考》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

我的叙述走的是循环之路，而不是按照直线发展。一些主题后来又回来了，借助于我们先前所讨论的东西，这些主题得到了再次的关注。这就是理解的所有努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理解上，每前进一步都是朝先前的必要阶段的一个回归。我们认为我们过去完全理解的东西显示出新的问题的印记，而先前我们对它们没有注意。这种过程永无止境，但在其进程中能收获良多。

这本有关鲍曼的书也是如此。

社会学及其他

鲍曼是一位社会学家。这意味着他将人类行为视作一个更为宽广的结构的一些因素，将人类的行动者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中联系在一起。这是他的职业。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要将“熟稔之事物陌生化”，使世界更顺应于个体和集体的自由。他非常清楚，当人们能自由地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时候，这可能被视为会破坏现存权力关系的

稳定。

鲍曼的社会学具有内在的批判性，热衷于考察“常识”；换句话说，常识是社会习俗和偏见的混合物，通常我们根据它们安排着日常生活事务。然而，当鲍曼破坏了“常识”的路障的时候，他行进在哪条路上呢？人们可能向任何一位批判性社会学家提出这个问题，而大多数社会学家总会说他们的学科具有内在的批判性。

在这一点上，认为鲍曼是非同寻常的社会学家是恰当的。他也是一位具有相当实力的社会哲学家，例如他非常熟悉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列维纳斯。不仅如此，鲍曼在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在 80 年代晚期，他的夫人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依然是“一位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坚定地信奉平等、自由、正义，尽管他现在更乐于把它们视为“西方的、文艺复兴的价值观”。

最后，鲍曼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而且他还是一位成功的故事叙述者、一位历史叙事的制造者。鲍曼工作的力量中最重要的部分来自他所讲述的故事。这些叙事的结构和活力告诉读者他们所处的时空，还告诉读者他们正在行走的方向，也许是应该行走的方向。这里可以将鲍曼和维布伦作一个比较。维布伦抓住历史的关键，把它作为道德的故事来重新书写，以事实展示由人类事务中的武力、欺骗、幻想、自我欺骗上演的戏剧。他追寻“掠夺成性”倾向——获取和控制财富的动力——的过程，显示它是如何窒息根深蒂固的“手艺本能”的表现；换句话说，它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从事有目的的活动的倾向。维布伦预言资本主义的崩溃将使劳动集团为公共利益投身于有益的和建设性的合作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一旦虚假的需求和破坏性的冲动的压力消失，手艺的本能将得以复活，人类多种可能性的新景象就会展示出来。维布伦认为人具有与他人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的自然倾向，这与鲍曼认为人天生具有关心他人的倾向的观点有类似之处。它们作为被掩埋的财富深藏在心灵之中，当时机成熟之际，两者的功能随时可被挖掘出来。

两个叙事是鲍曼早期和晚期的作品的中心：一是朝着传统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前行的叙事；一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的叙事。两者都开始于“传统的”社会秩序的崩溃，两者都有英雄和先驱者，两者都以采取某种行动或作出某种选择的读者的挑战而结束。

我想，一些阅读本书的读者会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词感到十分困惑。假如它们的意思对你不成为问题，那么你最好还是略过下面两个部分。然而，假如你依然感到困惑，或者，假如你只是对我有关这两个词的理解感到好奇，那么往下阅读，你会理解我的这些段落是针对初学者的。

何谓现代性

每个人都知道，假如某件事是“现代的”，那么它就是新式的，它与最新的观念相吻合，比以往的想法更先进，这最明显地适用于诸如照相机、小汽车和高技术的厨房设备。这些现代用品被现代人所渴望和购买。它们由现代组织制造和销售，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企图在第二年或者第三年设计更现代的产品。

现代世界持久地高速向前发展。现代性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在1975年，这一节中的许多术语对任何人可能都没有意义。打开你的手提电脑或掌上电脑；用它上互联网；进入一个搜索引擎；现在去寻找一些涉及现代性思想的网站；在其中浏览；跟随这些链接。让我们去发现在历史中，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作为生活在现代的现代人来描述他们自身的。

你会发现现代性的思想、生活在“现代”的思想始于16世纪晚期的欧洲。现代意味着与其他不是现代的“时代”的对比，意味着与远去的、过时的、消逝的时代的对比。欧洲人开始把历史分成三个时代来看待，即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并不知道他们是

“古代人”。中世纪的骑士并不理解他们处于历史的“中期”。但是，我们像我们 16 世纪的先辈一样，知道我们是现代人。

在现代，三种强大的力量发挥了作用。第一种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国家已经把它的基础深埋在社会的土壤里，以税收的形式吸收营养。国家用税收收入建立它的强大的权力机器——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官僚机构、更多的炫耀，并且利用这些强大的权力机器去保护、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威胁它们所控制的民众。

第二种强大的力量是现代科学。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勘探了环境的财富，并且企图发现对物质的操作规则。他们改进了操纵自然界的工具，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力。武器变得越来越致命，药品变得越来越有效，发动机的功率变得越来越大。运输和传播系统已经渗入世界的深处。

第三种巨大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系统化的追逐。贸易商和制造商推动甚至强迫地方社区为市场生产。他们已经切断了他们通过错综复杂的习俗将劳力、技能、能源、原材料纳入新的获取金钱的关系中的路径。资本主义将全部人口纳入创造流动财富的活动当中。这种财富是一种可用来发动进一步变革的资源。

现代性的核心是为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而奋斗：过得更好，做得更好，得到的更好。这种竞争在几个层面上发生，例如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城市之间、帝国之间、政府之间、公司之间。任何因歧视、残疾、压迫和监禁而被禁止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竞争的团体都会感到极为不满。

“现代的”这个词假定，每个人都具有参与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斗争的权利。或者说，每个团体都要为其成员要求此项权利。当他们认为某些其他团体是“非人道”的或“不文明”的时候，他们可能希望去否定这些团体拥有同样的权利。

在现代性中斗争的一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这些思想体系竞相证明不同的要求和限制的合法性，通过官员、老板、专家把它们强加在民众身上。所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一个承诺，即

一个即将到来的更为美好的世俗存在。

一个有力的、受到科学进步激励的意识形态是制定计划的精髓，**■**专家采用理性的方法，依靠其科学知识来操纵世界以产生可观的收益。相反，意识形态也可以从一个科学的源头吸取灵感。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认为社会的竞争无论多么肮脏，都有助于那些最适应的人生存。这一假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在一个长久的竞争中获利。

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时与“自由放任”的市场意识形态相互交织。这一观点认为：尽管人们作为买方和卖方追逐着自我的利益，但是看不见的手可以确保在社会中有用的财富的总数会趋于增长，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获利。

“自由放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 19 世纪是强有力的，而且它们的影响在 20 世纪依然相当有力。在过去的 70 年间，其他的意识形态变得突出起来。民主获得了全球的支持，同时美国从漫长的孤立期中走了出来，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尤其明显。

民主经常和凯恩斯式的福利主义联系在一起。后者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能够采用这样一种方法管理资本主义，它就是人民在享有充分就业的同时，享有诸如教育、健康保健以及养老金等社会权利。现代的民族国家也是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别是集权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宣称国家的权力能被用于完善社会。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为每一个“大角色”——国家、科学、资本主义和人民自身——指派了特殊的任务。例如，集权主义给予国家和科学以主导的任务，而“自由放任”强调资本主义市场。在所有事例中，“赢家”都被假定为人民。这一实体有时代表着忙忙碌碌的利益个体，如工人、消费者或市民，有时代表着一个联合体，如民族、国家或无产阶级。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都被训练通过由某类意识形态提供的玫瑰色眼镜去看待现代性。制造这些眼镜、使它们明亮透明、确保佩戴合适的工作落入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的手中，落入政府、教育、媒体的手中。他们都是现代性的神甫。

何谓后现代性

在当前现代性的阶段，西方文化的明显特点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广泛地运用后现代性思想。谈论后现代性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已经终止。这样的表述更为准确：后现代性是被知识分子采用的一种关键思想，用以对付 20 世纪最后 30 年在“现代性”的宏大图景中出现的四个巨大变化的冲击。

首先，民族国家的规模缩小了。它们在宣称具有能力重塑社会方面越来越缺乏抱负。在 80 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和欧洲许多政府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策略。同时，苏联在 90 年代初期分裂，这导致了 20 世纪最持久和最富野心的国家发起的现代化试验的终结。计划精神的反对者认为这最终毁灭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利。

第二，风险意识增加了。在西方，人们被迫不再对一个忧心忡忡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的一生抱有什么希望。他们的生活必须与高水平的风险相伴随，他们必须做好他们能够应付的安排。旧有的安全网络已经被撕成碎片。家庭是一个越来越不安定的机构。福利国家不能满足人们对它的要求。最恐怖的是：科学已经显示出它危险的一面。

我们运用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快地驾驭着世界，从自然中榨取越来越多的东西，这都是为了给自己一种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感到自己能控制局面。风险急剧增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臭氧层空洞的发现，对英国牛肉的恐慌，对艾滋病的震惊和我们对治疗这种疾病束手无策，所有这一切都散播着一种悲观的论调。这包括三个方面：科学在产生好的结果的同时很可能产生坏的结果；科学威胁生活和健康的危险是惊人的，也是难以预计的；政府官员们可能掩盖和低估危险的程度。

第三，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已经切断了自身

和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而这种民族国家是凯恩斯式的福利主义所需要的。跨国公司要求自己的经营跨越国界。它们能使自己的投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依靠另一个国家的政府提供最好的政策。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它们对那些企图管理特定的国民经济的国家来说，本质上不再具有依赖性。事实上，“国民经济”这一思想现已变成了一个时代错误。

第四，欧洲帝国主义已经终结。在 1900 年，像伦敦、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维也纳、莫斯科都不是它们相应的国家的政治或商业的重要都市，它们都是巨大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帝国在欧洲之内或欧洲之外的总部。这个巨大的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它撞击的冰山就是美国，一个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它变得比老主人更强大。美国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介入对欧洲帝国主义来说是关键的，并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欧洲的众多帝国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沉没于波涛之中。一些帝国比另外一些有较强的浮力，并且只是暂时又损坏了表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扫除了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德国也衰败了。然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一个多种族的德意志帝国在希特勒手中得以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进一步衰落的速度。盟军的胜利毁灭了希特勒的帝国。战争也导致了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最终解体。然而在战后，斯大林在东欧重建了俄罗斯帝国。最后的阶段开始于 1989 年。苏联集团的解体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去殖民化运动。

这四个变化——民族国家的萎缩、危险的不断急剧上升、资本的全球化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衰落——共同导致了大规模的现代性建筑的重建。新的规则和惯例正在慢慢成形。在学习生存的适当策略的同时，我们依然在实现我们的希望。

关键的“承载”结构不再是民族国家。制度的大厦正攀升到较高的水平，一个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水平，一个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

际协定的水平，一个诸如欧共体的超国家实体的水平。

由知识分子培育的意识形态的全部功能在 20 世纪已经失去了说服和鼓动大众的力量。这首先适用于给予民族国家的计划功能以重要角色的意识形态。人民不想失去他们的民主选举权，但是，他们不再对政府怀有很高的期望。

欧洲在这场全球重建的游戏中是大输家。历经 500 年的欧洲在全球的卓越地位已经到了尽头。在 1945 年这一地位结束了。美国军事支持英国和法国的代价是这些旧帝国的崩溃，为“可口可乐资本主义”留出了空间。这是一种欧洲的联盟无法拒绝的报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美国享受了全球的准霸权。

帝国失落的深远含义开始缓慢地渗入欧洲人的意识当中。直到 70 年代晚期，欧洲人还生活在一种帝国的余辉中。然后，石油的冲击到来了。它显示了当便宜的能源必定由从属的第三世界政府向西方输送的时候，这种生活的日子也过去了。70 年代发生的对西方的一系列羞辱在伊朗新的革命政府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中达到了顶峰，卡特总统对此深感困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帮助结束欧洲的帝国主义之后，却让自己成为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家攻击的主要靶子，这些政治家因为他们的人民的悲惨和不满，需要有一个可恶的人物去谴责。在第三世界许多直指美国的愤怒行为，是在欧洲人的统治之下孕育了几个世纪的挫折的发泄。在对美帝国主义过多的关注下，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在此之前相当长的统治时期；甚至更容易忘记的是，欧洲人的文化和政治已经深深地受到欧洲几个世纪漫长的优越地位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是主人。对于他们来说，适应失去霸主地位的境遇、调整失落的心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承认这种失落的感觉是相当困难的。内疚和困惑淹没了其他所有的感情。对往日的思念是欧洲的“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在过去 30 年里，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活体现出一种强烈而隐蔽的哀

伤和空虚的情绪。“后”——后现代的、后工业的、后殖民的、后启蒙、后结构的，等等——已经成为经常使用的音节。这个前缀的反复使用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感觉：一种至关重要的变化发生了。无论“后”这个前缀在何时以这种方式被使用，它都带来了来自西方圣经传统的力量，要么是堕落之后，在亚当和夏娃失去天真之时的一种否定性力量；要么是弥赛亚降临到大地之后，在人类赎罪中的肯定性力量。

“后现代的”这一思想从 70 年代大西洋两岸文化圈的周围浮现出来，并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这个术语有时被用于艺术中激动人心的实验性作品，这种艺术用旧形式的碎片作为进行大胆实验的机会。正是从独特的欧洲人的经验中，“后现代性”这个词获得了强烈的幻灭、失望甚至绝望的内涵。

这一逻辑是简单的、有力的和毁灭性的。欧洲人在创造现代世界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然而，这块大陆在统治现代世界时却不再如此。结果是，西方的欧洲人在千年之末经历了一种“后现代的”存在。这个世界依然是现代的，但是“他们的”现代世界已经逝去了。

作为一个社会集团，欧洲的知识分子无疑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经历着衰落。国家的萎缩减少了他们被雇用的机会，削弱了他们工作的权利。专家们的不可信动摇了他们的威信。对一些人来说，欧共体业已提供了新的焦点。这是一个带有消除民族—国家色彩的计划。

然而，欧洲的公共氛围和政治争辩的场所是脆弱而支离破碎的。而且，欧洲是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结构中缺乏稳固的基础。没有一个泛欧洲的教育系统向泛欧洲的公众传达他们的思想。知识分子的争辩不能轻易地跨越国家的疆界。在整个欧洲，哈贝马斯、福柯和其他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可能被阅读，但是，他们的评论者之间能相互阅读吗？这些评论者是用不同的语言——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捷克语，等等——写作的。

欧洲帝国的崩溃、对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福利主义信仰的衰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真空。欧共体、后马斯特里赫特条